

从《释教育的意义》探析李子洲的教育理念

刘欢 张亚男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er.v4i7.4081

[摘要] 李子洲在他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最主要的革命阵地是在学校,榆林中学、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咸林中学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李子洲在四师立下的“救国勿忘读书,读书勿忘救国”的校训沿用至今。李子洲在旅京学习时期,就时刻关注着陕西的教育,在《共进》杂志上发表了《释教育的意义》一文,阐述了他对教育本身及陕西的教育独到的见解,以《释教育的意义》一文为本,结合其实践教学活动,从而探析李子洲对教育、教育者、教育内容的理念和看法。

[关键词] 李子洲;《释教育的意义》;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 G422 文献标识码: A

A Probe into Li Zizhou's Educational Idea from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

Huan Liu Yannan Zhang

College of Marxism, Yan'an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his short revolutionary career, Li Zizhou's main revolutionary position was in the school, Yulin Middle School, Shaanxi Provincial Fourth Normal School and Xianlin High School left his shadow, Li Zizhou in the four division set up "save the country do not forget to read, read not forget the country" the school motto is still in use. When Li Zizhou was studying in Beijing, he kept close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in Shaanxi.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 in the magazine Together. This paper expounds his unique views on education itself and educ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article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 and his pract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Li Zizhou's ideas and opinions on education, educators and educational contents are analyzed.

[Key words] Li Zizhou;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concept
Medium Image
Classification Number: G422 Literature Identifier: A Article No:

在北京求学的李子洲在李大钊等进步学者和五四运动的促使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认同感。后参与创办杂志《共进》,主张“提倡文化,改造社会”,此后,在该杂志上发表的《释教育的意义》一文,文中写道:“我的解释多半以杜威的学说为本。我以为杜威的教育定义是从各方面研究的结晶,是由广义中抽出来的准则,比较的最为完满,可以包括一切的教育意义。”^[1]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李子洲在旅京求学时期,不仅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还接受到了被称为“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新教育的拓荒者”的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李子洲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

义者,但他可以融汇其他学说之长,形成对陕西教育的独到见解,这为回陕开展革命教育工作,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让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当时令众多学子前赴后继的学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 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

杜威认为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生活维系起来和发展起来。广义地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人接触、相互影响、逐步扩大和改进经验,养成道德品质和习得知识技能,就是教育。李子洲在《释教

育的意义》一文中第二段开始就讲到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分别介绍了教育的广义和狭义的内涵之后,认为“况且由广义的教育中所抽出来的原则用到狭义的教育里边,多半是最妥当圆满的标准,所以要知道教育的意义,也应当从广义的方面研究起”^[1],在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方面,李子洲完全认同杜威的观点,并在后文中以教育的对象是人,用人作线索,说明广义的教育的意义,并拿儿童的发展进行举例论证,最后总结到“教育既是本人固有的能力从事发展,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使经验无止境地往前生长;更使人以经济的时间,准确的效率,增长它主宰经验的能力,以适应环境,做

完满生活”。这个观点就是对杜威的教育既“生活”、“生长”、“经验改造”的另一种完满解释,这样讲也“可以使教育的余味增加,不至使人视为枯燥可苦的事情”^[1]。

陕西当时的教育只局限于学校本身,并且只局限于课程本身,不注重学生的实践培养,李子洲虽远在北京,但观察到了这一点,在《释教育的意义》文末写道:“我的解释有不完全的地方,是我自己所知道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研究解释教育的意义,至少总可以纠正那些以教育为读书的谬见。”^[1]1912年9月2日,陕西省教育部公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4]民国四年(1915)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教育应做到以下几点:①修身科宜注意级训而施以实践之方法;②国文科宜注意读法、语法及姿势;③算术宜注意实际之生活;④历史科宜注意年代处所;⑤地理科宜注意国耻,以增学生同仇敌忾,爱国强身之观念;⑥理科宜注意自然界知识之统一;⑦图画科宜注意用具整理,观察问答;⑧手工科宜注意范作之指导等;⑨唱歌科宜注意歌曲次第,歌词意义;体操科宜注意生理;小学练习宜以身治为的方针^[3]。从这两个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教育虽然囊括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具体要求,但这些都只对课堂中所教授的内容作出了要求,忽略了社会实践,比如国文课只强调了读法、语法和姿势,而忽略了如何把课程和社会生活相结合;历史课要求注重当时所处的年代,而忽略了历史是现实生活的铺垫,不注重历史经验的整合等。除此之外,陕西的教育当时大多存续于学堂之中,我国虽然从古至今就有“家风”这一说法,但这更多的规范了儿童的言行举止,而没有对儿童的各方面像学校一样进行系统性教育,家庭教育没有发挥其更多的功能,大多数学生也没有进入学校进行学习。究其原因,家庭经济拮据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归根到底是民众大多忽视教育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当时的民众大多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只要

肯吃苦,基本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谋生的工作,另外,当时的中国时局动荡,能安稳读书的人少之又少。陕西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相应的宣传措施外,还在1935年颁布了《陕西省教育厅西安民众学校强迫入学办法》,对不接受教育的人以罚款的方式迫使其进入学堂。

2 教育者应顺应时代潮流,明确教育目的

“我们陕西现在的教育界人物——上自教育长官,下至出小教员,日每间纷纷扰扰,苦心积虑的办教育,而教育终无起色,原因固然甚多:‘不知教育为什么?’也是一个重大原因。”^[1]当时的陕西教育学府大多掌握在封建遗老遗少手中,或者被井岳秀这样的军阀所控制,“一班嗜孔臭害复古迷的人,以教育为读古人书,希圣希贤,所以他们专以教人作孔二的信徒为务。见解荒谬,不值一谈。”^[1]李子洲认为当时陕西的教育落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封建禁锢的遗老遗少和井岳秀这样的军阀没有明确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教育是目的是什么?单纯地把教育当作维稳自己势力和利益的工具,当时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高竹轩就是在井岳秀的授意下,为井岳秀培养奴才,对教育既没有自己的看法,能力又弱,不迎合时代的变化,固守陈旧,沿袭旧的教学方法。在这篇文章出版之时,全国上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新文化运动,但新文化运动的火苗刚传回陕北就遭到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抵抗,李子洲的好友魏野畴在李子洲回陕之前,率先回到陕西,在榆林中学任教,在校园里提倡白话文,宣传民主思想和马列主义学说,校园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充满民主与科学的新局面,这一改变立马引起了学校内部和社会上守旧势力的忌惮,迫使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在这样的情形下,李子洲更是认识到作为教育者,要顺应时代的潮流,现阶段应具有民主思想和马列主义思想,自身要明确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并且教育者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言传身教。

在这样的认识下,李子洲回到陕西后就是要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于是接

受志同道合的杜斌丞校长的邀请,在榆林中学担任国文课老师,在榆林中学任教时推崇新文化,同王森然商量后,自编白话文教材,选择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几篇文章,还有一些创造社的新诗歌,交给学校印刻室,油印成讲义,一边讲一边发给学生,榆林中学的学生王子宜在回忆录中写道:“李老師上课从不拿讲义,从不死背陈腐的教条,而是从社会进化史的角度,选择历史长河中若干扣人心弦、娓娓动听的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从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得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语)的结论。李老師虽不拿讲义,但每一节课都重点突出,观点鲜明,讲得头头是道,绘声绘色,同学们都听到入了迷,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和启蒙。”^[6]后前往陕西省立第四师范担任校长,确定了四师的办学原则是“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立志为陕北培养新的师资,改变文化落后的面貌,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进行革命,建立人类最科学最美满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办学宗旨为“发展青年身心;培养积极道德;注重科学教育;造就优良师资。”^[2]在办学过程中聘请了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荫等从北京高等院校毕业的高材生,思想进步,知识渊博,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民主思想,并清除一些清代腐儒教师;除此之外,制定《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组织大纲》、《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则》和《校务会议规程》等,并规定戒烟、戒酒、戒赌、爱学习、守时间、讲公德等纪律性条文,对学校的各个部门以及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方面面都做了严格规定,时刻践行着自己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原则,为革命队伍培养了刘志丹、武开章、李象九等一大批人才。

3 教育对象(学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

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教育对象也就是学生是实施教育活动的重要一方,李子洲

认为“儿童能受教育,由他有一种固有能能力。这种能力是儿童内部出来的,自动的发生出来的。就好像一粒种子,原有一种发展的力,所以加以灌溉,就能发芽生长。儿童唯其有学的能力,所以施以教育,才能发展知识。教育就是儿童固有能能力,发展开导,不是由外边灌输进去的。是自动的,不是被动的。”^[1]杜威的一个重要教育观点是:“从做中学”,他认为,学习教育应该摆脱死板的教学方法而创造出的社会化的生活环境,使儿童具有天赋的社交、制造、表现等本能,主张在学习上把“思维”和“直接用实物的作业”结合起来,在行动中“发扬天赋”。李子洲深受杜威这一教育理论的影响,认为学习具有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自主性,应在实践中让学生自己感悟,让思想得以升华,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只起引导性作用。

李子洲在绥德四师担任校长之时,以他的另一篇文章《陕西师范学校应革新的几点》为本,严格规定各学科的授课时,每星期为二十四至三十点钟,每天授课四点或五点,留给学生四点或五点的自习时间;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师范生实践的重要性,因此,派四师的学生去“夜校”当教员,他亲自去听课,考核毕业班学生在这里的讲课水平。除此之外,强调师范学校实验课程的重要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自己学会并动手做一样实验,在图书馆中预备较为周全的书籍,要去教员授课一点,必须把参考的范围指出,让学生养成自主研究功课的习惯;在社会实践方面,教师利用假期时间指导学生调查社会情况,指定阅读书籍,开学后交调查和图书报告,并以绥德四师学生会为依托,在陕北各校组织学生会,成立陕北学生联合会,鼓励学生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1月,绥德四师的年假工作要求是让团组织的同学们参加非基分会、农民协会,组织民校,成立通俗讲演所,调查农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将这些制成工作日记表,发动学生,

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既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又发动了工农武装群众;在党团活动方面,十分重视对成员的思想教育,利用夜间时间进行党课教育,除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之外,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与同学之间互相监督,并结合当时榆林军阀并岳秀的情况,揭露军阀的罪恶之处,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让党、团成员们逐步了解革命的道理,从意识上潜移默化地坚定反帝和反对封建的决心,并外化于行;在课余生活之中,结合时事,支持教员和学生排演剧目,有《复活的玫瑰》、《木兰从军》、《一只马蜂》等,让学生通过观看剧目或者亲自排演的方式,真正理解并认同民主思想和马列主义,从而将其作为理论武器,指导革命。王子休在《绥师一月印象记》一文中写道:“四师民主办学的风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参加过子洲同志主持的校务会议。校务会议不仅有教职工参加,还有学生代表参加。凡属学校的重大问题,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认真开展讨论。与会同志,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人人都以主人翁的态度,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在某些问题上,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不同意见,但大家能平心静气地交换看法,会议气氛是那样融洽、和谐,生动活泼。”李子洲带领下的民主治校,充分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提升了其主人翁意识,让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4 结语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这一程度上说明了教育需要与当时社会的革命性质和任务相适应,此外,毛泽东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952年还开展了扫盲运动,利用课余时间亲自去向工人、农民讲授新思想,李子洲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这些方面

不谋而合,都认为教育者应根据时代的要求去更新讲课的内容,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理论联系实际;国家领导人于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座谈会上讲到:“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5],绥德四师依旧沿用着李子洲留下来的校训:“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国家领导人认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6],李子洲在担任校长之时,提出:“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的口号。李子洲的教育观无论是当时的乱世,还是现今的和平年代,都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教育的看法有一定的契合之处,说明李子洲的教育理念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现在提倡素质教育,我们更应把李子洲教育的精华之处继续沿用,教育者明确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发挥引领性作用,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创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参考文献]

- [1]李敬,张晔.儒道释生死观的理论教育意义[J].智富时代,2015(06):390.
- [2]陕西省志教育志(第六十三卷)(上)[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283.
- [3]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选.(民国)辛亥革命时期教育改革思潮与教育论著选读:第4辑第14卷[M].2006:194.
- [4]窝窝.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J].新青年(珍情),2019(05):64.
- [5]吴晶,刘亦湛.习近平: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J].基础教育论坛,2014(29):56-57.
- [6]陈江鹏,和谷.《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02.